

李季 著

我的生平

第十章 留德一

赴德——做手勢——權利義務的分明——德國大學生的歐戰談——產業競爭的大決鬥——「你蔑視他人的程度還不夠」——「哀哀欲絕地喊救命」——「後來居上」——階級教育——擊劍打球與階級鬥爭——五個月的德文補習——「教授步法」——照例將馬克思大罵一頓——猶太人與中國人的腦袋——大可取法的講師制——敲開學問之門的先決條件——大學生的頓足和擦足——「爛羊頭」的博士——小小書城中的生活——經驗中的讀書方法——讀書口號——哥白尼與「非聖無法」——達爾文與無神論——第二個口號——養成

批評能力的五個要點——學問家的要素

留德的方針既定，即開始覓伴同行。此次乘博圖斯號來歐的，除留法學生和我外，本還有上海同濟大學的幾位留德學生。不過他們坐的是三等艙，我們是四等艙，無形中有些形格勢禁，彼此均不接談。他們此時都在巴黎，我託人介紹，乃得與S君等兩人同赴德國的佛郎克佛。

由法至德一路經過好些戰區，但偏在夜間，無從視察，因此減少我一種憑弔的資料。低佛城後，即託此間同學在城內佛郎克佛大學附近租下一間房子，以便補習德文，作為入大學的準備。

我的房東是一個機器工人，他的老婆係一個洗衣婦，都只受過國民教育，自然不曉外國語，因此我初時向他們打交涉，簡直和啞巴一樣，只能做手勢，真是非常困難。此地雖有幾個中國老留學生，但既非素稔，又帶有幾分看不起

新來學生的氣味，且其住所和我的相距甚遠，故難得其幫助，一切均須由我自己去辦。

我于到後兩三日內：在餐館中遇着一個懂英語的德國大學生H君、和他攀談後，即領我到他的住所，介紹同學G君做我補習德文的教師，言定每日教課兩點鐘，G君因此獲得一種意外的收入，非常高興，登時邀我同到書店買一本粗淺的德文書，回去即從字母教起。他教了一點鐘遽爾停止，我初以為是要休息幾分鐘，後經H君的說明，才知道已將買書的時間計算在內。我不覺暗自好笑，西洋人的權利義務真是分得太清楚了。

我在G君處每日雖只學習德文兩點鐘，然我的全部時間却都花在這上面，因此獲得迅速的進步。S君在來德的途中曾對我說：「我們在國內學了七八年德文，才能夠看書說話，你要想進大學，非專門預備三四年不可！」我以學習第二種外國文的經驗看來，雖知道這是一種故意作難的話，但預計總要一年才

可以看書說話，不意此次實地練習的結果，到了三個月，即能說幾句普通話，並翻閱淺近的書籍。

和我往來的幾個德國大學生都是參加過歐戰的（G君除外），一談及戰事，便津津有味。他們告訴我：怎樣坐飛機在法國的天空擲彈，怎樣遠隔二百里用大砲轟擊巴黎，怎樣用幾百尊大砲同時射擊，將法軍背後的陣地打成一條大溝，使之無從退却，怎樣衝鋒陷陣，死傷枕藉，怎樣身入重圍，殺出一條血路，怎樣被敵擊傷，視為服務祖國的無上光榮。我們說得天花亂墜，使我疑自己是在聽荒唐小說。其實這都是確切的事實，一點也不荒唐。但是一涉及戰爭的結果，他們就哼的一聲，將話匣子關住了。

我和他們談話，見其處處流露一種狹隘的愛國熱忱，而對於法人則視為不共戴天之仇，不獨在大戰中不准同伴說半句法國話（德國中學以上的學生大半懂法語），即在戰後，仍舊如此。資產階級為着產業上的競爭，藉武力為後

盾，造成軍國主義，迨戰事既開，爭城奪地，據爲己有（德國之于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），養成兩國的仇恨，復以愛國主義相號召，不獨因此驅策本階級的子弟，使之爲階級的利益，自心情願效命疆場，並且麻醉了無產階級的羣衆，使之當炮灰。此次世界大戰在表面上好像原因復雜，在骨子裏不過是德與英法等國產業競爭的大決鬥罷了。戰後雙方的仇恨日益加深，報復之心，有增無己。這種事實就是告訴我們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決鬥並沒有解決產業競爭的問題，只是這一方壓倒了牠方，歷時不久，將再有一次大決鬥（屈時的形勢不限定是原來的兩方重決一次勝負，多半有勝的一方的某一國或幾國與敗的一方聯合戰鬥）。啊，何止再來一次，資產階級一日不倒，像這樣的大決鬥將連三接三地來個不休。資產階級倒的快慢，要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覺悟，組織，爭鬥精神和策略怎樣，牠是不會自己顛撲的。最好是在第二次大決鬥中或工商業大危機中乘時崛起，將其打倒，否則全人類即得不到解放。

這些資業階級的子弟除掉談論他們是得意的參戰行動外，間常涉及中國的
問題。他們對於中國具有一種蔑視的心理，總是異口同聲地說：中國人蓄辮
子，纏小脚，抽大烟，吃老鼠。問其何以知道此等真假參半的事，據云在小學
校時聽見教師講的。我後來詳加考慮，才知道這不是一樁偶然的事。格來與羅
斯伍姆 Alex V. Geiher-Russnurm) 說，古代一個政治家有一次對着一個少
年政治學者說：「你決不能宰制他人，因為你蔑視他人的程度還不夠。」凡一
個國家要想宰制另一個國家，必先使其國民極端鄙視另一個國家的人民，否則
機會一來，牠的國民將有所顧慮，不能盡量發揮其宰制的能力。德國小學教師
要將這些事告訴小學生，正是他們將成其小國民輕蔑中國人的心理的一種高妙
手段。不過這種把戲不獨德國人會頑，其牠各國無不如此，如日本小學生動輒
罵中國人爲亡國奴，英美小學生呼中國人爲 Chinaman，法國小學生稱中國人
爲 Chinoiserie，也當然是他們的教師循循善誘的成績。

中國既成爲東西各國一個輕蔑的對象，所以西洋人，且遇見一個話言流利，舉止大方，或衣服整潔的中國學生，必指爲日本人，如自己聲明爲中國人，他們猶持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，其意以爲中國也能有這種人麼？！

可是在另一方面，中國也自有招致侮辱的原因，如政治的腐敗，戰亂的頻仍，經濟的紊亂，法律的殘酷，學術的停滯，教育的衰敗，人民的頑固，風俗的澆薄，在在爲人所輕視，所謂『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』，並不能完全埋怨人家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中國人只有于慚愧之餘，急起直追，努力輸入西洋的科學，提高自己的文化，才不致過于落後。乃一班頭腦冬烘的人不此之務，偏高唱東方文化高于西方文化，靦顏以先覺自居，竟欲以此去覺『西洋的後覺』。從前康有爲要派人往歐洲傳播孔教，某西人斥他爲『不要臉』。最近梁啟超輩又以爲西洋的『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，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

有辦法』，於是決心要拿中國文明去拯救全世界，因而大聲疾呼道：『我們可愛的青年啊！立正！開步走！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，哀哀欲絕地喊救命，等着你來超拔他哩。』梁氏居然說出這種話來，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弟！

我當然不是一個『洋迷』，一味崇拜西洋文明，而蔑視中國文明，辯子先生從前總是埋怨中國學生拿着放大鏡去看西洋的文物，故愈覺其大，却將鏡頭反看來看中國內的文物，故愈見其小。但我的觀察西洋與中國文物是全憑自己的肉眼，並沒有借助于這種放大鏡的倒順兩端，故自信能作持平之論。

中國係一個開化最早的國家，誠如柏格森 (Bergson) 之師蒲陀羅 (Bouten) 對梁起超所說：『我們祖宗裹塊鹿皮，拿把石刀在野林裏打獵的時候，你們不知道已出了多少哲人了。』但中國的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，即停止不進，西洋的文明雖發達較遲，却是後起之秀，使我們有望塵莫及之嘆。更具體地

說，中國的文明是封建社會的，至多也不過是商業資本主義的，西洋的文明是大工業資本主義的，是財政資本主義的，兩相比較，當然是「後來居上」。「工業發達的國家只是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將來的模型」。十年以前，有一最大部分的新文化運動家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大工業，然這種大工業仍是一步步地前進，並不受他們絲毫的影響。中國要步西洋文明的後塵（這句話自然不是指按照牠的程序，一成不變地重演一遍），是爲歷史發達的定律所註定，無可逃避的。中國人目前的大任務是在盡力輸入西洋較高的學術以補自己的不足，決不是將自己固有的舊學術送往西洋去『超拔』『大海對岸那邊好幾萬萬人。』自然，現在如有人，將中國某種哲學，文學或藝術介紹給西洋人，供其研究與參考，我並不反對；但如厚着臉皮，極力誇獎自己的文化，號召青年以拯救全世界自任，我就不能不斥其狂妄了。

我的話說得太遠了，現在再回轉來講德國的大學生。德國是一個資本主義

最發達的國家，所以他的階級的界限非常嚴明，而各階級所受的教育也幾乎各有定規，不能超越。工人階級的子弟大半只能受到國民教育，小資產階級的子弟則多止于中等教育，而資產階級的子弟才能夠享受高等教育。因此各大學中學生的成份以資產階級為最多，小資產階級次之，至于工人階級簡直可以說是沒有。他們的思想行動都是反動的，例如和我相識的幾個大學生，有屬於資產階級的，也有屬於小資產階級的，然同為社會主義的死敵，他們一聽見這個名詞不獨將掩耳疾走，並且還要忿怒填膺。總之一千個大學生中恐怕找不出兩三個相信或表同情于社會主義的。工人階級一旦起來騷動，危及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，他們必投入軍隊或自衛團中，以生命相抗（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中即有這種表現），所以德國以及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在大戰之後猶能支持不敵，原因雖多，而其階級本身統治力量的堅強，實為一個主因。

我所認識的幾個大學生會因歐戰失學，及解甲歸來，投身大學，均極發

奮，然他們却喜從事一種遊戲，就是擊劍，雖因此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，亦所不惜。這不僅是他們幾個人的嗜好，一般學生也無不酷嗜此道，時常打得頭破血流，疤痕滿面，而美門的女郎偏喜尋找這種人才爲戀愛的對象，因爲牠門認此等疤痕爲勇敢的標誌。德國學生的擊劍與美國學生的打球可以遙遙相對，他們的直接目的固爲鍛鍊身體，而其間接目的則在擔負統治階級的任務。自階級制度出現以後，凡站在統治地位的人無不以講武爲先務，不獨從前的皇室貴族如此，即現在的有產者也是如此。他們且顧慮到軍官學校所培植的人才不足供階級爭鬥之用，故于遊戲之中普遍的養成一些作戰的健兒。我們對於他們擊劍與打球等等如果僅視爲一種單純的遊戲，那就是所謂『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』了。

我因從 G 君補習德文，得和這些大學生往來，除言語上獲得不少的幫助外（遇到困難時即借助于英語），算是初次對於西洋人有一種比較深烈的認識，

誠爲一舉兩得。不過三個月之後，我即停止G君處的功課，轉入佛郎克佛大學特設的外國學生德文補習班，此班開課已久，我係中途插入，幸對於所教課程猶能趕上，不感十分困難。同班的學生共有十餘人，都來自歐洲各小國，如保加利亞，土耳其等等。

我在補習班肄業兩個多月，即屆放假之期，時間雖甚短促，然對於練習作文聽講等項都有長足的進步。在放假之前，固不必經過考試，但中途插班的學生于放假後須受大學的德文試驗，取錄後才能入學。因此我必須經過這種手續，幸此時已能作文，會話，聽講，故對於考試能應付裕如。在半年之內，居然達到這種目的，真是『始願不及此』。

我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正式入佛郎克佛大學政治經濟科聽講，此校爲德國最有名的新大學之一，而本科尤爲各科之冠。今特將見聞所及，舉其學學大者于後，並附以評語。

(一) 校長。大學校長在名義上雖主持全校，但在實際上除掉開學時出來演說，與學生見一見面外，平常一切事務都用不着他操心，因此他于教課以外（校長係由教授中推舉出來的），與學生很少接洽的機會。這與中國各校的校長恰恰相反。在中國每逢更換一個校長，可以使全校的組織根本搖動，而在教授治校的西洋各國便沒有這種毛病，算是一個優點。

(二) 教授。在學術發達的國家做一個大學教授是一樁極不容易的事，所以教授（內中也分好幾等）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，他們也自命不凡，處處可以表現出來，尤其是走路有一種特別姿勢，不疾不徐地一大步一大步向前進，這是所謂『教授步法』，和前清的官僚各有其與品級相稱的步法，正復相同。

在每科教授之中有一個主任教授，凡學生選定科目，須經他簽字才發生效力，這與我國學校的教務長相似，不過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，而我們的教務長大概只是一些不能教課的飯桶。

我在前面說過，大學是資產階級子弟的大本營，其中的教授不用說，是資產階級的導師和擁護者。凡社會科學的教授在講堂中講課，照例要將馬克思大罵一頓，這不獨在德國的各大學是如此，即在其他英，美，法，意等國的大學也無不如此。但在佛郎克佛大學却有一個特點，牠竟因特殊的關係（私人捐款的關係），聘請一位自稱爲「馬克思主義者」的有名的經濟學者阿白海默（Ernst Oppenheimer）當教授。

阿氏是一個雙料博士——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——對於經濟學，社會學等科確有精深的研究，著作極多，不過他要掛「馬克思主義者」的招牌，不免有些僭妄，因爲他對於這種主義時常站在資產階級的觀點上加以「修正」，至多只是——如某雜誌所云——「一個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」。因此我對於他的學說不予以介紹，惟將他所提出的一個頗饒趣味的問題略加討論。

我們中國一般有智識的青年大概聽見過「猶太老板」這個名詞，久居滬上

的人更知道哈同——猶太人——爲上海最大的地主和商人。其實全世界的猶太人不獨以多財善賈見稱，並且以出產大學間家有名于世，如李嘉圖，馬克思，愛因斯坦等是其中的最著者。不僅這樣，德國人對於猶太人，不論其爲資本家或工人，一律痛恨，他們恨資本家，是因其盤剝重利，恨工人是因其宣傳社會主義（猶太工人大半係社會主義者）。可見猶太全民族的聰明才智確是高人一等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出身于猶太族的阿白海默在講堂上常對我們說：「每個猶太人至少懂兩種語言文字，即猶太族的知所在國的。一個人如果懂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字，對於任何事物的了解，必定比僅通一種語言文字的人更爲透徹。猶太人在學業上能站在最前列，原因即在于此。」

這種說法再加上到處受壓迫的事實，的確可以解釋猶太族所以出產事業家與學問家的原因。同時我又連帶想起一椿事，某日人謂：「論全世界人的頭

腦，以猶太人爲第一，中國人爲第二。」這句話似乎不算過當。中國是一個開化最早的國家，在春秋戰國時已經文物大備。歐洲中世紀末火器，印刷器和羅針盤的三大發明都早已創始于中國。中國人既沐浴長期的文化，又因文字繁雜複雜，須經過很久的訓練，才能運用，故思想要比其他文字較簡易的民族更爲精密周到。在現今的過渡時期，我們雖覺得事事落後，但如果環境順利，肯幹的話，也正不讓人。觀于用功的留學生的成績常在同班學生之上，即可見一般。

(三) 講師。我國各大學的講師係按所任鐘點的數目，由學校每年送致十個月的薪水，在德國大學則不然。講師的收入全以聽講人數的多寡爲標準，要想吸收學生，須首先在學問上努力上進。還有一層，一切主要科目足以招致聽衆至數百人的，均被各教授占去，因爲他們認此爲基本的知識所關，非親自講授不可，留下給講師的功課不是附屬的，就是專門的，聽講的學生總不會滿